

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后勤保障工作研究

程波

【摘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强大的保障力，就没有强大的战斗力，因此后勤保障直接影响战争进程和结局。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发展壮大除了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红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坚持排难创新、团结奋斗，克服自然环境恶劣、军需物资短缺等诸多困难，建立了高效统一的军事后勤指挥体系、链条化的武器弹药生产体系、军民共济的日用品生产供应体系、隐蔽高效的战略物资采购体系、专业化的工程兵部队、群众广泛参与的运输保障体系和规范化的医疗卫生体系，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

【关键词】川陕苏区 红四方面军 后勤保障

【课题组负责人及成员】程波，通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乾金，通江县委宣传部正科级干部；李晓军，通江县文联副主席；李坤蓉，网信委办公室副主任。

1932年12月至1935年4月，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广泛参与下，创建了以通江为首府、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苏区；不仅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与探索；还架起了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从战略上策应甚至接应了其他各路主力红军的长征；更是锻造了一支对党忠诚、

信念坚定、作风优良、能征善战的红军劲旅；孕育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川陕苏区精神。特别是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和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等极端恶劣条件下，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关于军事后勤保障工作的方针政策，立足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边的实际，探索建立了一套高效、规范和可持续的军事后勤保障体系，不仅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200余场战役战斗的胜利提供了高效的后勤保障，还有效改善了苏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屹立于川陕边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红四方面军高效而强大的后勤保障能力还在接应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发挥了雪中送炭的关键作用。其展现出来的排难创新精神，对于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党高度重视军事后勤工作

兵家常云：“兵无辎重则亡”。强军制胜，必须以强大、完备的后勤保障工作作保证。战争是敌对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物质力量是基本的。后勤保障工作是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能打胜仗的重要基础。“自有战争以来，后勤保障的成败一直关系着战争的发展和结局。直观地看，战争是武器、士卒的对抗，是谋略、指挥的角逐，但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后勤保障的较量。离开了保障，人无粮草、车无汽油、炮无弹药，就不可能形成作战能力。”^[1]

我党建军伊始就高度重视军事后勤工作，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始终坚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初心底线，始终围绕“坚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

了胜利”不断探索创新，建成了一套根本区别于旧军队的为了人民、又依靠人民的军事后勤保障体系。

1927年，我党创建军队之初，由于军事后勤保障工作体系尚不完善，军需物资匮乏，导致乱拿群众物资、侵害群众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当年10月2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大汾遭遇肖家壁靖卫团袭击。战后战士们十分疲惫饥渴，便在一块红薯地挖红薯吃。毛泽东随队伍赶上来，看到这一情景很是生气。次日，毛泽东向部队宣布了“三条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根据部队住宿时借用老百姓的门板、稻草作铺板、铺草，部分战士用后没有主动归还等情况，向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禾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当年4月，合并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不仅主要明确了军事后勤工作的纪律红线，更是为新生的人民军队树立起了时时处处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侵犯人民利益的信仰标杆，对于工农红军的建设，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团结人民和瓦解敌军，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更为我

军后勤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为迅速构建我军的后勤工作体系，1928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军事工作大纲》提出，红军应当建立军需、军医、军械等后勤机构。随后，红军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探索建立适合于自身特点的后勤机构。井冈山斗争时期，红4军军部下设军需处、军械处、红军医院、被服厂；团部设随军行动的卫生队，设留守处。^[2]革命战争打的是后勤仗。毛泽东、朱德等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虽然有了相对稳固的后方作支撑，但由于所辖区域相对偏僻落后，财政收入不足，物资十分匮乏，军需物资的筹备与民众生活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党明确了红军的三大根本任务：打仗、筹款子、做群众工作。其中，筹款子即是军事后勤工作的一部分，在红军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对中心区域根据地的巩固问题作了如下概括：“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毛泽东把储备粮食、建设医院等后勤建设，作为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重要任务、重要工作。自此，军事后勤工作成为我军至关重要的工作，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保障革命斗争的胜利，党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开展了一系列经济建设，并逐渐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军事后勤保障体系，对军事斗争的开展、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我党我军探索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后勤保障工作经验，为全国各根据地、各工农红军起到了良好的借鉴、示范作用，更为我军军事后勤工作的发展起到了坚实的奠基作用。

战争是检验军事后勤工作优劣的试金石，也是探索积累军事后勤工作的试验场。在卓有成效的军事后勤工作的保障下，中央红军取得了反第一次“围剿”、反第二次“围剿”、反第三次“围剿”等一系列重大军事斗争的胜利，根据地不断扩大，军队不断壮大，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日益密切，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并于1931年11月7日，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后，又取得了反第四次“围剿”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指出：“充实红军的给养与供给，组织联络前线与后方的军事运输，组织军事的卫生治疗，同时，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激烈严酷的军事斗争中，军事后勤保障能力建设逐渐形成三条主线：一是筹粮筹款；二是抢救伤员；三是取之于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军长期处于不利的军事形势和经济形势之下，后勤保障工作在全军范围内处于分散状态，只能实行“分散经营，独立保障”的方针，由各根据地、各部队负责筹划和组织实施。各根据地红军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军事后勤工作政策，借鉴成功经验，根据地和革命军队不断发展壮大。

二、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后勤保障体系建设的举措和成效

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面临着敌人不间断的、残酷的军事“围剿”，“从我军入川到强渡嘉陵江的两年零三个月里，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4]“红军打仗，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三要兵员，四要武器弹药。”^[5]不仅战争十分频繁激烈，而且敌人对川陕苏区的经济封锁

也越来越严密，后勤物资筹措既迫切又极具挑战。

“苏维埃政府为供给战争的需要，一定要解决红军的粮食，红军的费用，红军的一切需要。”^[6]

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党政始终把军事后勤工作放在重要位置。1933年6月，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明确要求：“解决军事上后方的需要，如收集粮食、准备物资帮助医院等等”^[7]。1934年10月，中共川陕省第四次党代会通过的《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明确指出，“解决物质的困难，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在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绝对保证工农红军的给养与供给，改善工农的生活，这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财政经济政策的目的，便是供给红军的需要，改善穷人的生活，增加群众的利益，保证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8]并号召“地方党和苏维埃要用尽一切力量动员一切物质资源，供给红军需要和增进工农利益，来战胜敌人，巩固苏区，扩大苏区和红军。”^[9]。

（一）建立了高效统一的军事后勤组织体系

红四方面军初入川时，后勤机关为总经理处，负责各种军需物资的征集、制造、运输和分配。下设军需、粮秣、会计、总务等科和骡马大队一个直属单位。各级经理机构比较简单，人员精干。

1933年3月7日，中共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通江城召开的“扩红运动周纪念大会”，在川陕苏区掀起了第一次扩红高潮，“师、团均成立了新兵营、连，妇女独立营也组建起来，进行训练。全军发展到一万八千人，每师三个团、一个特务营，建制和装备比较齐全”^[10]。反“三路围攻”胜

利后，红四方面军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扩编，同年6月23日在通江新场坝召开的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作出的《红军与地方武装决议（草案）》指出“在新的伟大胜利基础上，红四方面军已扩大为四个军的单位”^[11]。部队由入川时的1.4万余人扩大到4万余人。面对部队扩编后更加繁重的后勤保障任务，在随后召开的木门军事会议上，方面军不仅对扩编后的红军部队的正规化训练进行了研究部署，还对部队的编制体制进行了规范完善，特别是将后勤机关总经理处改设为总经理部，直接隶属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军需、粮秣、军械、被服、会计、出纳、保管和总务等科和运输大队（后改为骑兵营）、监护连两个直属单位。各军、师、团均设后勤机构，营、连设后勤人员。红四方面军还根据战事需要，设立前方经理处和办事处等临时机构。如总经理部先后在西线（阆中、南部）前线、东线（达县）设立前方经理处，作为部的派遣机构，随红四方面军前方指挥机关行动，任务是将缴获的物资分类清理后送走，将后方运来的军需品下发一线部队；1933年秋，在阆中洪山场设立盐业办事处，协助地方迅速恢复井盐生产，以缓解根据地缺盐的矛盾。^[12]至此，红四方面军后勤机构进入了体系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根据《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基本实现合署办公，从而把红四方面军的后勤机构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经济主管机构的力量整合起来，形成战时条件下苏区经济建设、军队后勤保障工作的高效协同机制。特别是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还兼任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省工农银行行长、造币

厂厂长。他在具体组织领导苏区经济建设和红军后勤保障工作中，就加强和改善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建立“收支两条线”“购买制”等财经制度以及反对财经领域的官僚主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如他于1933年7月7日在《干部必读》第22期发表的《我对财政经济工作之意见》一文就指出：“目前川陕苏区日益开展与巩固，红军猛烈扩大与坚强，关于‘经济物质集中统一支配’问题，是迫不及待的要来彻底整理一番，才能适应目前革命战争胜利条件。”他于1934年1月31日在《干部必读》第72期发表的《从实行购买制度中来节省经济》一文中提出“今后除赤区买不到的军用品和宣传原料领取外，其余一律实行购买制度，以期节省经济。”^[13]，在《干部必读》第72期发表的《打击无视组织系统的官僚主义》一文要求：“今后前方各军以及后方各机关各团体需要物质，每月一定要有精确的预算决算，和详细的报告表，”^[14]，这些重要的政策建议实施后，不仅提高了提高的军队后勤保障的效率，还对推动苏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他被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二）建立了链条化的武器弹药生产体系

从古至今，武器弹药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是绝对的。“武器弹药是军队战斗力的直接表现。”“中断前线武器供应就是牺牲战士的生命。”^[15]“打那么长时间的仗，你没有手榴弹、步枪、子弹、迫击炮，光靠大刀、木棍、石头怎么行呢？怎么能打垮优势装备的敌人呢？”^[16]

川陕苏区创建初期，红四方面军依靠从鄂豫皖转移过来的随军修械所，在通江县城南郊苟家湾建立了一个100多工人的小型兵工厂，由于设备简陋、原料短缺和人才匮乏，仅

能进行枪械修理和子弹复装，导致很多武器弹药有耗无补，满足不了部队发展和战争需要，其武器弹药保障主要靠战场缴获。枪支弹药的匮乏严重影响了红军整体战斗力的提升。1933年7月，当时方子翼所在的红30军264团共1000余人，排以下人员全是四川的新兵，除少数人有匕首或自备的杀猪刀外，有的只拿一把农具或者一根木棍，剩下的大部分人是基本徒手，因此被称为“徒手部队”。8月22日，264团在仪（陇）南（部）战役中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每班分得2支。直至同年10月，营（山）渠（县）战役结束后，264团战士才全部有了枪。^[17]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取得宣（汉）达（县）战役胜利，缴获了刘存厚兵工厂全套机器设备和大量原材料，并吸收了数百名技术人员和工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组织万余名群众，花费月余时间，将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搬运回通江县苟家湾，扩大了兵工厂。1934年3月，兵工厂迁至通江苦草坝锣坪。兵工厂鼎盛时期共有1400余名工人，各种机床138台，下设兵器制造厂、修械厂、子弹厂、炸弹（手榴弹）厂、制药厂及一枪房、二枪房、三枪房等生产部门。每日最多可生产子弹约8000发、手榴弹500余颗、修理枪械近百支（挺）。^[18]自反“六路围攻”开始，到撤离川陕苏区的一年多时间，红四方面军兵工厂共翻造子弹一百余万发，生产手榴弹一百余万枚、迫击炮弹3万余发，修配机枪两百余挺和迫击炮两百余门。据1934年7月24日《干部必读》第86期报道：“兵工厂厂长楚风梧同志发明一座小炮，打六0炮弹，又轻便又好打敌人”^[19]由此说明，红四方面军兵工厂还能够生产六0山炮。

此外，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保卫局联合各县经济公社、在通江钢溪河、南江大黑滩、万源等地建立了 10 余家钢铁厂和煤厂。当时规模最大的通江钢溪河铁厂有八个分厂，2000 多名工人，两年时间生产生铁和粗钢约两百万斤。其生产的铁条、钢条、对钢等产品，不仅满足了红四方面军兵工厂的原料需求，还通过秘密交通线，销往陕西汉中、甘肃天水一带，换购回药品、纸张、通讯器材和食盐等大批紧缺物资。

1933 年 11 月 4 日，《川陕省各级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提出：“各县要加紧扩大地方武装，成立新的独立团、独立营、赤卫军、游击队等，实行办火药局、兵工厂，自己造刀枪。”^[20]，各军、师经理处和各县苏维埃政府主办的各类中小型兵器修造厂、煤铁厂进一步发展壮大，如长赤禹王宫兵器厂、巴中综合工厂、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军械修理厂、红九军随军兵工修配厂、江口红军军械修理所、南江县造枪厂、石庙子兵器厂、正直兵器厂、陈家湾兵器厂、文昌宫铁工厂等。至此，川陕苏区形成了从采（煤、铁）矿、炼铁（钢）到生产枪支弹药的完整军工链条，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三）建立了军民共济的日用品生产供应体系

川陕苏区创建初期，为保障部队供给和群众需求，要求“各县要调查各地的出产品，设法增加生产，各处开办各种手工业的工厂，特别要发展对红军的需要和工农群众日常需要物品的生产。”^[21]，红四方面军总经理处（1933 年 7 月后为总经理部）和苏维埃政府，迅速以军办、军政合办、政府主办、鼓励个人创办等各种形式，建立了以通江苦草坝为中心、涵盖十余个轻工业门类的军需民用物资生产供应体系。

从被服等穿戴用品的生产来看，据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军需生产管理部党史征集领导小组编撰的《军需生产史料丛书（军需工厂简介 1927--1949）》记载，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城南岭、蹇家山创办了川陕苏区的第一家被服厂（后称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被服总厂），起初只有两架缝纫机，大部分是手工制作，生产效率不高；1933年10月，红军缴获刘存厚被服厂、纺纱厂的全套机器设备和二万余套棉衣、二十余万匹棉布后，被服厂的规模和生产能力大幅提升，有工人500余名，缝纫机60多架，还分设了剪裁、机打、手工作坊等生产部门，主要生产军服、军帽、军鞋（布鞋、草鞋）、挂包、子弹袋、绑腿带等，有时一天就可生产上千套成装，在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前，该厂还赶制了一批部队渡江用的油布包，被服总厂直到1937年1月才完全停止生产；与此同时，部队直接兴办的还有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被服厂、红9军被服厂、红30军被服厂、红30军被服分厂、红33军98师被服厂等，其中，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被服厂工人达350多人，分为纺纱、缝衣、扎鞋三个连和一个弹花班，有手摇纺车150多架、织布机14架；红30军被服厂，不仅250多人工人从1933年7月坚持生产到1934年10月，还采取1.7斤棉花换1斤棉纱、再以每匹布8-10吊（铜元）加工费回购布匹的办法，有效利用南江长赤坝民间的4000多架织布机资源，建立起了从纺纱到加工成衣一条龙的被服生产体系；川陕省总工会创办的刘华工厂工人也达到200多人，除生产军服、军帽、军鞋、挂包、子弹袋、绑腿带外，还生产干粮袋和布袜；另外，赤北、赤江、红江、苍溪、阆南等县苏维埃都兴办有被服厂，其中红江县苏维埃被服厂工

人达 360 多人，赤江县沙溪区、毛浴区第三乡苏维埃政府也办有被服厂和绑带厂。

1933 年 2 月，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在通江苦草坝兴办的纺织厂，到宣（汉）达（县）战役胜利后，工人增加到 100 多人，织布机（也称大机床）增加到 47 台，不仅能生产加工军服的窄幅布（宽一尺二寸、长三至四丈、用经纱 380 根），还能生产制造布币用的宽幅细布（用经纱 1100--1200 根、纱支粗细均匀、细密不漏水、刀切不卷边）。织布厂还织袜子、毛巾、纱布，生产挎包等，既提供部队，又供应民需；同时创办的染整厂，能将布匹染成蓝色、淡灰色、深灰色，特别是工人们克服染料和漂白粉缺乏的困难，用稻草灰、烟脂（松枝烧成的炭黑）、苦楝子树皮、核桃壳、黄泥巴、指甲花（染领章、帽徽用）制作染料，将黑牛粪用水浸泡发酵后替代漂白粉，满足了生产的需要。不仅如此，1933 年 3 月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在通江县城南岭兴办了皮件厂，工人达 70 多人，主要生产子弹袋、手枪套、马辔头、枪背带、马刀鞘、文件袋、皮鞋等；总经理部 1933 年 7 月在通江县城蹇家山兴办的弹花厂工人达到 300 多人，主要加工棉絮和棉衣；赤江县沙溪区苏维埃政府还兴办了丝织厂、红 30 军 90 师兴办了雨帽厂。各级部队还兴办了斗笠厂，其中红四方面军经理处 1933 年春在通江苦草坝创办的斗笠厂工人一度达 150 多人，红 9 军和红 30 军斗笠厂工人也分别达到 100 多人；同期在通江钢溪河兴办的红四方面军脚码子厂，采取统一供原材料、分散生产、每场（每旬逢二、五、八赶集）定量交售 45 双、每双付加工费 600 文的办法，每月脚码子产量达 5000 余双；苍溪县苏维埃政府兴办的脚码子厂工人也达到 100 多

人。

由此可见，川陕苏区时期，军地共同努力建立起了从纺纱、织布、印染到加工衣被的完整纺织工业链条，且其生产能力和工艺水平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还解决了枪支背带、马刀鞘、子弹袋、米袋、雨具、防滑用具的生产供应问题，甚至能够生产丝织品和皮件，全体指战员行军、作战、宿营必要的穿、戴、盖、挂件和避雨用品基本实现了自给。

从1935年(刘)世模给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红四军十师过嘉陵江前后的实力报告》中说：红28团“四、五两月共制造单衣九百七十六套……制造军帽一千二百五十顶，四月造三角布一百四十七条……五月造裹腿二百四十双……四、五两月造小米袋五百二十条……五月造洋锹五十一把”，三十六团“自过嘉陵江到现在，自造单衣六百七十七套……做斗笠三十顶……大衣十件”，师政治部“有铁匠二人，正在打铁造船”，师经理处“自过嘉陵江至现在……总共做的单衣一千八百九十八套、棉衣六十套、夹衣二十套、皮带十六件……”^[22]，而1935年4、5月间红四方面军连续经历了强渡嘉陵江和土门战役，表明红四方面军在离开川陕苏区开始长征时，各团级单位都具备了较强的被服生产能力，即使在激烈的战斗环境中也没有中断。

在食品加工方面。在通江境内的若干个军粮库所在地，基层苏维埃政府把群众的藨子、石磨、榨油工具集中起来兴办了大批粮油加工厂，开展碾米、磨面以及加工面条等粮食加工。据《通江苏维埃志》记载，红四方面军经理处于1933年1月在通江苦草坝兴办了第一家米面加工厂，工人达150多人，设加工车间、保管室、运输队、管理排、警卫排和饲

养组，日产面粉 1500 斤、大米 3500 斤，还利用加工米面的下角料米糠和麦麸饲养马 80 多匹和大量生猪，同时红军在通江的流二沟（今兴隆镇）、麻石还办有临时米面加工厂，特别是总经理部在通江苦草坝兴办的“油米子”厂，将大米炒熟、发汗，再拌猪油炒黄，送到火线上后，红军战士就着开水就可食用，开启了加工方便食品的先河。在满足米面油等基本生活品供应的基础上，省苏维埃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机关和基层政府还通过直接兴办和鼓励私人创办等方式办了一批粉厂、酒厂、糖厂，在通江城南、沙溪和苦草坝分别开凿了盐井，尽力提高苏区军民的生活质量，特别是仪南战役胜利后建立的碑院盐厂，盐井 3560 口、盐灶 450 个、盐工 5000 人，从根本上缓解了苏食盐供应紧张的局面。

在日用品的生产供应方面。1933 年 8 月红江县苏维埃政府在陈家坝、芭蕉坪、两重堰兴办的工农纸厂，日产纸张约 3000 张，基本满足了苏区一般公务和民用纸张的供应；巴中特别市在巴州区城区兴办的烟子厂，生产的染料、油墨、胶墨，促进了苏区纺织、印刷业的发展；1933 年 3 月初，赤北县朱坪庙乡苏维埃政府兴办的肖家河碗厂，共生产土碗 1000 多筒；1933 年春复产的长坪锅厂“计有 6 个分厂，共铸锅 12300 余件”^[23]。据《通江县苏维埃志》记载：1933 年 7 月，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部达成统战密约后，长坪锅厂采购员杨继周，率 20 余名工人，多次背运尺六、尺八锅到汉中，先后换购回上万斤食盐等紧缺物资；同年 9 月仪南战役胜利后，苦草坝经济公社一次就曾派 300 人，将毛边、折五锅运往南部以锅易盐，不仅缓解了盐厂熬盐锅缺乏的矛盾，又丰富了苏区的食盐供应。

与此同时，川陕苏区还兴办了造币厂、印刷厂、铜铁加工厂、火柴厂、造船厂、犁铧厂等，其中红四方面军造币厂能生产4种20多个面值的货币，据1933年12月6日《红军》第27期报道：“自消灭刘存厚后，苏区的印刷事业开始巨步的前进，铅印、石印、木刻三个印刷局规模甚大，不日即可开工，大大印刷各种书籍、报纸、宣传品等”。^[24]毛浴镇铜铁加工厂共生产了3000多个号嘴、铸手榴弹壳1万多个、打马刀6000余把、打长矛1.2万余把，苦草坝铁工厂则生产了大量军用羊角锄和窝锹，“1933年，（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先后在南江、巴中、江口、苍溪等地开办了造船厂，新造和修补旧船，解决运输，服务于战争。1935年1月，在苍溪县王渡造船厂150多名工人，经过1月余时间的艰苦奋斗，修造了大小木船200多条，为红军胜利渡过嘉陵江创造了条件”。^[25]

通江苦草坝（今永安镇），大通江河流域的重要集镇，其后山原名龟山寨，三面绝壁、其上平衍，早在战国末年即辟为古蜀道重要驿站，在汉室平定三秦的伟业中立下大功被高祖赐名得汉城。两千多年来，这里作为兵家必争之地，被文臣武将们试图打造成“天铸铜城”，但无论是高墙壁垒、还是所谓“众志成城”，都没有改变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宿命。1932年12月23日，红军入川的第六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此召开了入川后的第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兵分三路解放通（江）南（江）巴（中），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发布红四方面军《入川十大政纲》，当年12月21日，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在泥溪成立后，鉴于苦草坝周边山险林密、便于隐蔽的特点，便将200余名残废军人集中安置于苦草坝

观音井，川陕苏区后勤基地建设便由此发端；翌年1月，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在苦草坝街道建立纺织厂、染整厂、斗笠厂、铁工厂和石印厂，开始实施苏区军需生产基地的建设。1933年2月，原属赤北县的苦草坝市（区级市）升格为直属于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苦草坝特别区（县级），省委、省苏和特别区委组织群众于1933年秋开始，对大通江河航道进行了整治，使得苦草坝至小江口河道能通行三吨左右的船舶，苦草坝至钢溪河的煤铁原料水路运输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时红四方面军被服厂、兵工厂、造币厂和川陕省经济公社总社等重要工商企业以及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等又陆续迁驻于此；1934年初和年底，又分别修建了苦草坝与通江沙溪、涪阳等后方基地的陆路通道，方便了后勤中心到反六路围攻东、西两线主战场的物资运输；1934年4月开始，分别在苦草坝大通江河上修建了长420米的浮桥，在大小锣坪的溪沟上修建了石板桥。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建设，苦草坝及其周边的得汉城、锣坪、小坪溪等方圆约10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了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盐厂、粮油加工厂等十余家大型工厂，其中锣坪兵工厂工人达1400余人，形成了从纺线、织布、印染到加工衣被的纺织工业完整链条。同时，还在苦草坝街道及其周边建立了万担粮仓，川陕省工农银行金库和川陕省经济公社总社战略物资储备库，在长达10个多月的反“六路围攻”斗争中，这里生产的子弹、手榴弹和炮弹源源不断地输送前线；这里维修的数万支枪和数百门炮解决了前线的燃眉之急；这里加工的数百万斤“油米子”和数十万件衣被、斗笠对前线战士们战胜寒暑和饥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4月，刘湘对川陕苏区发起第三期总攻期间，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部后方机关、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机关陆续迁驻苦草坝，这里便成为苏区临时指挥中心。

在“奖励开办各种工厂和企业，欢迎自由投资，苏区、白区各种资本都可以。”^[26]“苏维埃政府对于遵守苏维埃法令的中小商人，均准其商业上的自由，并予以苏维埃法律的保证。”^[27]等政策措施的激励下，苏区各地兴起无数手工业工厂、经济合作社，有力支持了红军军需和满足了群众日常用品的需求。1933年10月11日《苏维埃》第9期刊发《赤江县经济建设大进展工农踊跃办合作社》，原文如下：“赤江全县建石灰厂一个，织布厂一个，华（铎）厂、造纸厂，每区建立十几个，是私人经营的，打油榨已成立二个，经济公社十余个，药铺六个，烟子窑一个，各种建设都在进行。现在前方盐又多又便宜，工农正在凑钱合股办合作社到前方去买盐，粮食各种合作社都在进展。”^[28]如通江鹦哥嘴的铁匠肖乾富，红军解放通江后，他召集多名徒弟开办铁器工厂，生产了数千件农具，还生产了一千多把大刀、数百把梭标、数百个脚码子，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期间，红军收紧阵地，他和徒弟把铁器工厂转移至通江鹰龙山，继续生产。

在艰难的处境中，红四方面军和苏区政府打造出了一支难不倒、打不散、摧不垮、拖不烂的生产队伍。为执行“收紧阵地”战略战术，很多工厂多次转移，但工人们始终以高昂的斗志，坚持边转移、边生产，并努力克服原材料短缺等困难，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同时，在战事紧急时，全部

工厂开展生产竞赛活动，夜以继日地进行生产，确保了军需供给和市场供应。

（四）建立了隐藏高效的战略物资采购体系

面对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四方面军在白区党组织的配合下，并利用与国民党左派反蒋势力的统战关系和赤白交界区域的边贸渠道，建立了稳固的后勤物资采购体系。1933年4月13日通过的《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要求“红五月中要准备一万石粮食，红军及地方武装、游击队到白区去打粮。要动员群众把地主豪绅藏在穷人家里的粮食要穷人自动的报告。要地主豪绅的案子到白区去替我们买粮食。红军各机关要设法到白区收买粮食，征收富农，有计划的保存粮食。”^[29]

同时，还建立了多条秘密交通线，甚至开辟了远达武汉的物资采购渠道，采购电台零配件、细白布、纸张等。“反三路围攻的胜利，还进一步促进了敌人阵营内部的分化。四月，驻陕西的国民党十七军军长杨虎城，因不满蒋介石的排除异己政策，同时鉴于红军力量日益壮大，继续同红军敌对于己不利，授意驻陕南的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与红四方面军开展统战合作。杨虎城委派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在前往通江与红四方面军联系，要求达成互不侵犯协定。红四方面军即派徐以新赴汉中谈判。在空山坝大捷的胜利影响下，孙蔚如终于和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秘密协议。”^[30]秘密协议达成后，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利用杨虎城特使的公开身份，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建立了汉中至苏区的三条秘密交通线，为红军输送了无线电器材、医疗器械、西药、汽油等紧缺物资和若干重要情报。红四方面军“一度在

南郑的碑坝和西乡的楼房坪等地，就曾设立过转运站，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弹药和其他战略物资，供川陕苏区紧急时使用。”^[31]

1933年6月21日《陈昌浩给四川省委的信》要求：“沿赤区四周建立秘密交通网，有系统的侦察敌情和消息，并设法暂时将我们的必需品送来……请速同阆中县委发生关系，送大批文件由阆中转。”^[32]1933年8月25日，《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明确：“中央责成你们就近领导四川省委的工作”。^[33]川陕苏区和中共四川省委就建立了一条由成都途经三台（柳池城关联络站）、秋林驿成恒药室联络站、县城东门外李沙罐联络站、盐亭“恒丰泰”绸缎铺、南部富村驿（今盐亭县富驿镇）、南部（建兴）、阆中（彭城和徐垭口）、苍溪（五里子和烟峰楼），渡东河到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四川地下党组织向川陕苏区传递了大量情报、护送了廖承志等200多名革命骨干和运送了大量战略物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人才招聘广告还一度出现了成都街头，对打破蒋介石以及四川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据曾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的刘毅（姚明善）回忆：“王天洪同志是中央交通局长。他高兴的对我说：‘姚明善同志，组织决定到重庆做地下交通站的工作，这个工作十分重要又十分危险。那是在敌人的虎口中工作啊。随时都可能牺牲，你愿意做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工作吗？’我笑着回答：‘只要党需要，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王天洪同志说：‘好吧，你立刻去脱下军装，马上出发。’我换上老百

姓的衣服后便立即出发，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同志。就这样，我们一行三人离开了川陕苏区的首府——通江。从此开始了我在秘密交通站里的生活。”^[34]“用袁大头、孙小头和川版等仿造的白区银圆从白区购买军火、电台、器材、白区颜料，主要是在重庆、成都。另外也到陕西去买一部分，也有一部分在武汉买。”^[35]

“川、陕两省的地下党组织，也数度派人越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向川北运送粮食、衣物、药品等物资，给我军以有力支援”。^[36]川、陕两省白区党的组织，在配合方面军反围攻作战方面，也作出了积极贡献，不仅源源不断向苏区提供给大量重要情报，还在敌人后方组织了有效的袭扰，如1934年2月6日《共产党》第43期以《田颂尧勾子后面中江万余抗捐军正向潼川方面游击》为题报道：“成都不远的中江地方，有上万的抗捐军勃起，有枪数千支正向潼川、保宁方面游击……”^[37]。

（五）组建成立专业化的工程兵部队

一是地方武装部队战时配合作战，平时修桥铺路。据《红四方面军战史》记载，1932年12月10日，红四方面军在陕西城固，成立红四方面军陕南第一游击大队，拉开了创建川陕苏区地方武装的序幕。当月下旬，将通江城鹦哥嘴、三花顶的穷苦青年组成“通江城游击队”并迅速扩编为360余人的通江独立营，随后各县建立了完整的地方武装组织。1933年2月上旬召开的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就明确要求：“党要切实扩大和加强游击部队，党要建立赤卫队，领导并建立少先队、童子团的组织，这种组织都要带有很大的军事性的力量，尤其是动员群众来配合红军行

动”^[38]。1933年2月中旬召开的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规定省、县两级苏维埃政府设立军区指挥部，统一指挥辖区的地方武装，从此，赤卫军、独立团、游击队、妇女独立营等地方武装建设进入高潮，1933年8月召开了川陕省地方武装代表会议。据有关史料记载，整个川陕苏区时期，不仅稳定保持了一支九万多人的地方武装部队，“九万多地方武装力量，是红军作战的得力助手”^[39]，还通过地方武装改编方式向红军主力部队输送的兵员达七万人以上。“这次（木门军事会议）扩编，采取由地方武装、赤卫队向主力红军升级为主的办法，较好地保证了扩兵的质量”^[40]。

在地方武装的职能定位上，1933年4月13日印发的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要求：“加紧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军事政治训练、站岗，放哨，配合红军行动，配合游击队去打游击，参加代耕班、运输队、担架队及一切政治运动和后方工作。”^[41]。首次就地方武装的职能职责进行了明确。1933年6月召开的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通过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决议案》规定：“（二）迅速按区按乡成立赤卫军、少先队，其编制按照红军办法，村、乡、区按照地域大小，人口多少，成立排、连、营、团等有经常的军事训练，除站岗、放哨戒严外，并需经常配合红军行动，做工事、做木城、修道路、桥梁及骚扰游击、袭击、截击和配合红军作战，及在红军击溃敌人之后，帮助红军清扫战地与追击敌人，党、团员均参加这种组织作领导骨干。”^[42]1933年8月，川陕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西北军区赤卫军条例》规定：“……四、苏区赤卫军的具体任务，主要是下面几点：（1）

轮流站岗放哨,检查行人,搜捕地方反动,搜缴赤区内的一切反动武装,维持地方苏维埃的秩序与工农生活上的安宁,保卫赤区的边疆。(2)在红军与敌人作战中,赤卫军应全体动员,配合红军作战袭击敌人,包抄敌人,破坏敌人的电线、道路、桥梁以及各种交通工具,截留或烧毁敌人的粮食、军火,帮助红军摊派岗哨,到处呐喊助威,组织运输队、担架队、运粮队……等。”^[43]1934年10月召开的川陕省第四次党代会通过的《开展游击战争的决议》明确要求:“各县赤少队要立即进行下列工作……2、在赤区主要据点建立工事堡垒……4、建立侦探网、交通网,严密站岗放哨……”^[44]。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地方武装主要是在‘保卫地方,保卫家乡’的口号下,维持地方治安,捕捉反动分子,协助红军做工事、筑木城、修桥铺路、侦察敌情、剿匪等”^[45]。从上述历史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印证了当年川陕苏区的地方武装担负了做工事、筑木城、修桥铺路等工兵部队的部分职责。

1933年3月29日至4月25日,在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作战的第二阶段,红四方面军主动收缩到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垭、杀牛坪至得胜山,由得胜山向东北沿麻石场、龙凤场至竹峪关一线时,趁田颂尧、孙震令所部就地休整之机,“军民结合,抢修和加固防御工事”^[46],其中,在杀牛坪修建的部分立体式战壕和碉堡至今还较好保存。在地方武装的参与下,川陕苏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辉煌的业绩。“1933年初,红军和当地群众,先后在通江毛浴镇、南江的沙河,巴中城西门外,建造了100多米长的木桥”^[47]。

“1933年7至10月,省党、政领导机关组织大批的人力、财力,参与修复从通江经巴中到阆中、南部,通江到陕南等

地的交通干线，以便利红军阵地转移和保证军用物资运输。1933年至1934年间，各县、区向军政机关的重要便道也进行了修整，如清江渡到通江的干道山路，以及通江县烟溪到涪阳坝。从通江至沙溪嘴到苦草坝的横山便道等，均修筑完好。”^[48]据《通江苏维埃志》记载：“又整修了从通江城至木溪桔、再至过街楼、再至长滩河、再至下土门抵江口千秋的65公里干道山路。”^[49]，“历时3月，疏通了300里河床（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坝），原来“河中大石林立，舟行不便”，整治后“舟船行驶畅通，便利军民运输，减少生命危险，也减少了巴、通下游水患”^[50]。“总之，红军解放一座县城，群众就随后修桥补路。就这样断断续续地修补，很快建立了以巴中、通江为中心的四大交通干线，即巴中到南江、巴中到通江，到万源、宣汉、达县；通江到巴中、江口，抵营、渠，沟通了根据地各战略要地”^[51]。“苏维埃还组织群众疏通了一条以通江为起点，沟通陕南的河道，方便了川陕间的运输”^[52]从上述史料可见，当时国统区的媒体都对川陕苏区时期的交通建设给予了正面报道。

二是建立了我军第一支妇女工兵部队。于1933年1月成立的红四方面军被服厂，在当年2月就分设男工厂和女工厂，宣达战役结束后“上级决定女工厂改编为妇女工兵营。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同志认为，女工厂的工人和战士，除了做军衣、鞋子等，还担任一些运输任务，作风很象战斗部队，干脆改称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后为杨文局），政治委员王泽南，副营长刘伯兴，秘书、教员杨文局。下设三个连：一连连长邓廷郁、指导员吴兰英，二连连长贺福祥、指导员舒秀英（后改名赵顺德），三连连长张茶清，指导员赵正富。

全营 300 多名（也有说为 500 多名）工人和战士” “女工厂的任务主要是缝制军衣、编打布草鞋，有时还要往前方运送粮食，往后方运战利品。” “之所以取名‘工兵营’，和我们担负的任务分不开，既当工人又是兵。”^[53]

1934 年，反“六路围攻”越来越激烈，为保障前方供应，总经理部决定临时将妇女工兵营的三个连合并为两个连，第一连由营长林月琴带领继续承担被服生产任务，第二连由政委王泽南率领驻洪口特区的兵站部执行运输任务。“运输连有二百来人，除了管理员和炊事员是男同志外，其余都是穷苦人家出身的女同志，大的不过三十来岁，小的才十几岁，组成了一支红军女运输连。运输的物资主要是粮食，还运送布匹、军衣、枪支和弹药。我们唯一的工具就是一块布单。平时，这块布单既当铺的褥子，也当盖的被子。运粮时，把布单卷成个筒子，两头用绳子一扎，就是背粮的口袋。”^[54]

1935 年春，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妇女工兵营的两个连都主要承担运输任务。“我们除了背个人的行李外，还要背营里的物资，有些干部还得帮供给部背贵重物资。”^[55]

“当时，我们妇女运输连日夜转运枪支、炮弹，或向前方的部队运送粮食。”^[56]

川陕苏区时期组建的妇女工兵营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衣、帽、鞋袜等后勤物资的生产任务，还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冠名“妇女工兵营”的专业运输部队，她们与红四方面军系统其他运输部队共同构建了川陕苏区时期军事运输的骨干体系，承担了许多重要物资运输和伤员转运任务，与苏区各县苏维埃政府组织的群众运输队一道，为红四方面军后勤保障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是建立了我军第一支舟桥部队。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和苏区党政不仅十分重视水路运输。通过疏浚河道，修建码头，兴办船厂，组建了多支水路运输队，满足军事和民用物资运输的需要。同时，高度重视河川战的战略战术研究、训练和实战运用。1933年9月曾中生撰写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就专门论述了河川战的作战要领，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印发的《军事干部会议各种报告大纲》亦将河川战的战术要领列入军事干部的培训内容。

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先后召开了毛浴政治工作会议和清江渡军事会议。毛浴政治工作会议明确了“冲破反革命的‘川陕会剿’，来汇合红二、六军团，中央苏区红军，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实现”^[57]中心任务；清江渡军事工作会议讨论了粉碎“川陕会剿”的战略方针和任务，制订了“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1935年1月，总指挥部决定乘敌“会剿”一时难以开始之际，组织发起广（元）昭（化）战役。1月22日，广昭战役发起当天，便收到中央电令：“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接电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旺苍城南峰寺观音阁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乃主动撤广昭之围，收缩东线部队，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在战役准备阶段，红四方面军一方面“即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北向，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并接应已经进入陕南商县

一带的红二十五军”^[58]，另一方面，根据专门制定的《河川战初步演习计划》明确的“上下船的动作、军人渡河的动作、架桥的动作”等具体详细的战术要领，“深入政治动员，利用支流河汉苦练渡江本领，保证部队具有必胜的信心，熟练掌握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59]。特别是“在造船工作和渡江训练过程中，方面军还组成了专门担负造船、架桥任务的水兵连。”^[60]这便是有史可查的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成建制水兵部队。

1935年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旺苍城王爷庙组建成立直属水兵连，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兼红军大学副校长李特在成立大会上分别讲话，主要讲述组建水兵连的目的及建制、任务等。王树声在讲话中指出“组建水兵连就是为了渡江，但渡哪条江，暂不告诉你们，到时候就自然知道了。原来考虑完成渡江任务后水兵连即撤销，你们仍回各部队去，后经研究，决定水兵连列入建制，直接归总指挥部参谋处领导。因四川河流较多，保留这个连有好处，你们要做好一切准备，加强操船、架桥和泅水训练，在训练中要开动脑筋找窍门，做到技术过硬，机动灵活……。”水兵连辖4个排，16个班，共220人。由杜万荣任连长（后为田启堂），胡孝宏任指导员，陈某某任副连长，胡正明任副指导员。

水兵连成立后，在红军大学教育长兼军事主任徐深吉的领导下，当即在旺苍城边的东河长滩坝开始了紧张的泅水、操船、架桥训练。战术上着重训练偷渡和强渡的突击动作，以及登陆作战、巩固扩大登陆阵地、火力支援、保障后续部队投入战斗等战术动作，并将架设浮桥作为主要训练课目。

强渡嘉陵江任务完成后，水兵连跟随主力红军，踏上了

新的征途。在长征途中，屡建战功。1936年10月下旬，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遵照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在甘肃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水兵连奉命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成功帮助21800余人渡过黄河，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六）建立了群众广泛参与的运输保障体系

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61]

其实，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反“三路围攻”的开始阶段，对运输队伍的组建重视不够或效果不佳。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通南巴的物资不算短缺，我们处在内线作战地位，按说供应不成大问题。但恰恰相反，这正是最叫人头疼的一大难题。那带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尽是大山，交通运输极为不便。运送粮食、弹药、物资和伤病员，全靠人力背和抬。从这山到那山，站在山头上喊话能听见，但走起路来，就得花半天到一天的时间，的确是‘蜀道难’啊！第一阶段作战中，由于运输力量不足，前线就出现了粮食接济不上来，伤员运送不下去的困难。有些山头、垭口，本来还应再守一守，但不得不放弃。撤离南江、巴中县城，许多我军急需的物资转移不走，只好一把火烧掉，叫人心疼得很。”^[62]

他还说：“因此，我们下决心增强运输力。由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统一组织，编制县、区、乡的运输队伍，管饭给钱，分段‘接力’，构成数条连绵不断的运输线，保证伤号、弹药、粮食、盐巴及其他物资，顺利运送和转移。这支运输大军多达数万人，在反三路围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3]。这支迅

速组织起来的数万人的运输大军，使得反“三路围攻”第三、四阶段的作战就显得异常从容了，如在敌人1933年4月26日发起直指通江城的进攻开始后，仅三天时间就完成了首脑机关以及位于城区、城南和蹇家山的工厂设备和库存物资的搬运工作；5月23日空山战役胜利后，到6月15日红军的追击部队就直逼广元城下。“川军素有‘川老鼠’之称，溃败时不仅跑得快，而且耍花招。官兵往往把枪支、弹药、辎重、衣物、银元等，沿路丢弃，让对方去拣，以便自己逃命。这次，敌人如法炮制，又玩起了边跑边丢东西的把戏。我们命令各部队一律不许打扫战场，只管猛打穷追敌人”^[64]红军作战部队能够有这样的底气猛打穷追，而不担心弹药物资供应和打扫战场等战勤服务问题，与运输能力的迅速提升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这支数万人的运输大军，是以川陕苏区首先解放的通（江）南（江）巴（中）的群众，特别是通江县境的“三县两特区”的群众为主体，随着苏区的扩大，到反“六路围攻”的作战中，就有了“数十万运输大军，是前线和后方一体化的血脉”^[65]的恢弘场景。徐向前元帅还回忆说：“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川陕时期，参加运输队伍的群众达二百万人次以上”^[66]。

红四方面军及省、苏、乡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常设运输队，分为陆路运输队和水路运输队。红四方面军的常设运输队主要有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马号排发展起来的骑兵营、兵工厂运输队、造币厂运输队、米面加工厂运输队、妇女工兵营运输连、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担架营以及各军师管理处运输队和军师医院担架队等构成。常设运输队主要由青壮年男

性组成，进行长距离支前运输；亦有少量的妇女和年纪稍大的人，进行短距离支前运输。其中，妇女工兵营运输连和医院系统的担架营（连）主要由女同志组成。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很多时候也承担运输任务，据有关史料记载和当事人回忆，1933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组建后，经过不到两个月的训练，就于5月中旬参加了竹峪关战斗的伤员转运工作，当月下旬一天黄昏，在为反“三路围攻”总反攻阶段担负追击作战任务的部队运输弹药粮食的途中，与敌左纵队一个团在通江县城后的鹰龙山遭遇，该营即利用夜色掩护、三面包抄突入敌营，未损一兵一卒便将正在抽大烟的敌人全部俘虏，缴枪几百支，妇女独立营的首次军事作战的胜利，则是其履行战勤任务的意外收获，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武装在不断发展壮大中独立或与其他红军部队协同承担了一些作战任务，但其主要职责还内卫和战勤服务工作。^[67]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系统的常设运输力量则呈网络化布局，“川陕省苏维埃交通委员会以下，设立了运输处和交通局，分别组建运输队和交通站。管理人畜运输和水陆交通要道、船工的联络等项工作。县、区、乡苏维埃建有交通站、队，并设有交通员若干人，负责本地区的交通联络、传达、运输等项工作，使交通运输顺利进行……1933年2月，以通江为中心的交通站普遍建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交通站亦日益增多。各县、区、乡的交通要道都设有交通站。为了加强运输，一切非军用的骡马，都由苏维埃集中起来，供各交通站调拨使用……平时各交通站有一些数量的‘背二哥’（背力运输的人）。”^[68]“水路运输队由苏维埃政府集中所有船只统一组建而成。其形式是以渡口为单位，把修旧、新造的三

四只船编为一个组，四五只船编为一个队，由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随船同行，专搞物资运输。”^[69]

川陕苏数十万人的运输队的主体还是苏维埃政府组建的各种临时运输队。“根据地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都要组织运输队，并按军事化组织编为连、排、班或者小队、中队、大队的运输队伍（10人为小队，30人为中队，120人为大队）。参加运输队伍的人员，由乡村苏维埃统一安排，并选举产生不脱产的连、排、班长，负责组织运输和管理生活。由一名红军负责安全……运输队每运一次政府给报酬，除按运量付给工资外，运输队员可凭证明在沿途招待所食宿不付钱。由于青壮年男子大多参加了红军，所以妇女和年纪稍大的男子就成为运输主力，地主富农也在监督下参加运输。运输队主要是运输粮食、盐巴和武器等物。”^[70]他们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并参加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战时或有重大突击运输任务时则闻令而动，参与向前线运送粮食、武器弹药，向后方转运伤员和战利品等运输行动。

据《通江苏维埃志》记载：仪南战役后，各级苏维埃政府，各经济公社贫民合作社，都分别组织了由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不等的运输队，前往南部碑院寺、流马、建兴、柳边驿一带抢运盐巴……‘三县两特区’境内，计有3万多人次上路运盐和其他战利品。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后，红军缴获了大量的军需物资，以及兵工厂、造币厂、棉被厂等全套设备及大量原材料，为搬运缴获的战利品“仅仅在战争开始的一个月内，从达县城将缴获物资抢运后方的人数，每天就达到了10000余名”。“打开绥定府后搬刘存厚的兵工厂，因青壮年都上了前线，45岁以上的人都去。”^[71]，无数

支临时运输队，肩挑背扛、水陆并进、昼夜兼程，行程 150 余公里，历时一个多月，从达县搬运到通江。《李先念传》记载：从达县到通江多是山路，没有交通，运送物资只能靠人力背抬，又逢雨季，道路泥滑难行，这支由民工组成的运输大军特别艰苦。但他们都是翻身农民，眼见红军打了大胜仗，缴获那么多战利品，情绪都很高涨，不怕苦累，尽责尽力，川流不息，同后方运送。不少人有抬滑竿的经验，抬着重东西上岭下坡时，前后一唱一和，别有韵味：“前面洋洋坡哟”，“后面慢慢梭哟！”“陡上又加陡哟”，“越陡越好走哟！”“慢转十字拐呀”，“前摆后不摆呀！”“红军打胜仗呀”，“咱运战利品呀！……当红军指战员问他们苦不苦、累不累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过去那些地主老财和‘棒老二（土匪），经常拉我们的夫，给他们抬滑竿，背东西，不管饭，还常挨打。现在给红军运战利品，又管饭，又给钱，受了伤还给治疗，待我们真像亲兄弟一样，我们打心眼里高兴！”这些物资运到后方后，大大充实了红军的补给，川陕根据人民拥有自己的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对支援红军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接近前线或运输任务十分紧迫的地区，就人人出动，甚至小孩也参加。由于成年男子多已参军或加入常设运输队，妇女成为临时运输队的主要力量，亦有很多老人和十几岁的少年儿童。“‘六路围攻’开始后，敌人对我川陕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我军在粮食、油盐、衣着、弹药的供应方面都极为困难。川陕省苏维埃为支援前线，调集各县妇女干部组成‘妇女运输队’，向万源前线运输物资。从洪口到黄钟堡，沿线尽是崎岖的山道，还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女同志

每人要背大米 70 多斤，步枪一捆 4 支，迫击炮弹 1 人背 1 箱。她们穿荆棘，攀陡崖，忍饥渴，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手脚挂出了血，肩膀磨起了泡，克服了难以忍受的艰辛，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一夜行军 50 多公里，按时把物资、弹药送到了万源前线，保证了反‘围攻’战斗的胜利进行。”^[72]“为打好青龙观战斗，红江县妇女运输连，每人一个背篓，背了 30 公斤左右的弹药、粮食、盐巴，经过两天一夜的行军，翻过了几座大山，克服了无数困难，按时把前线急需的物资送到了黄钟堡。”^[73]“空山坝战役中，润生带领儿童团送粮送菜，张琴秋见后高兴地说：‘娃娃后勤队’辛苦了！”^[74]

作为临时运输队的主体，妇女不仅在承担紧急运输任务中屡建奇功，1933 年 5 月，红江县妇女赤卫营“500 农妇缴一团白军械”的经典战例，不仅被当月 25 日成都《蜀笑通讯》报道而动震动全川，还名扬莫斯科，1934 年 11 月 30 日，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上所作的《中国现状和中共任务》的讲演报告说：“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女士在红军离通、南、巴北上时，率农妇赤卫队五百余人，保护负伤官兵三百余人，驻于苦草坝附近。有田颂尧部一团，由小路袭去，张率农妇应战，敌军官长发现红旗，见前面山头有缠红布之农妇，即下令“八百米达发现敌人，各放！士兵不发一弹，山谷中口号大震：‘欢迎！革命的士兵兄弟到红军中来，！红军是打日本的先锋’！……官长下令“快放，‘齐放，但士兵仍不动。及团长率同马弁（即卫队）到来，以手机关枪督战，不前进者即用机关枪扫射。此时士兵大哗，其中有一下士向团长大声质问：‘老子们打了十几年仗，从未见过保国卫民的军队，放着东洋人帝国主义不打，打自家

人，还要同堂客（四川呼女人为堂客）两个打仗！真岂有此理！官长立即枪毙发言士兵。不料突来一片‘打死反动长官到红军中去’的呼声，一时大乱，团长亦被绑，营长以上者无一人幸免。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事件，已传遍全川。”

此外，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几次迁徙，兵工厂、棉被厂的转移，都临时组织了大批临时运输队进行运输。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时，数万名苏区群众昼夜兼程，把大批装备、设备，大量粮食、弹药，一万余名伤病员成功转运至嘉陵江西岸。

（七）建立了规范化的医疗卫生体系。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红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根据地的历史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75]红四方面军挥师川东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后，一直面临四川各路军阀的持续“围剿”，不间断的战争让红军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为保障军事斗争的胜利和苏区的发展，满足频繁战争产生的伤病员救治工作和苏区干部群众健康需求，红四方面军和苏区党政构建了军队医院为主、地方医院为辅，中西医治疗方法相结合的医疗体系，同时，重视公共卫生管理，大力开展卫生知识教育，建立起一套常态化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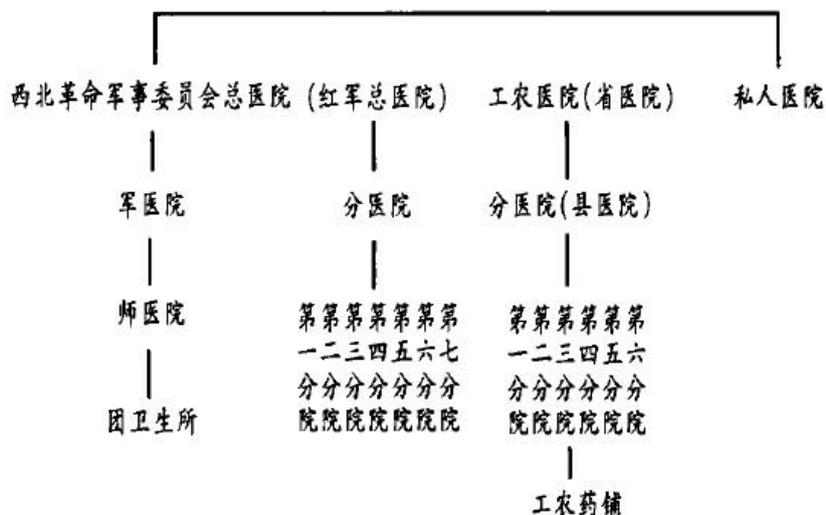
1932年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通江泥溪场以红十师医院为基础，并抽调红十一师、七十三师医院部分医务人员，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医院，后改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是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直属机关。总医院随战事需要，先后搬迁至通江毛浴镇、檬坝塘、鹦哥嘴、王坪和旺苍普子岭等地，其中，1934年1月至1935年1月在王坪期间的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收治伤病员最多。红四方面军总

医院是川陕苏区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核心，既领导医卫工作又兼管行政事务，下设政治部、医务部、总务处、医务学校、中医训练班和7个分医院；各军设有野战医院，各师设有师医院，各团设有卫生所，团以下配备有数量不等的卫生员。据不完全统计，宣达战役后，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形成了总医院1所、分医院7所、军医院5所、师医院15所、团医务所44所的军事医疗卫生体系。“从1933年4月到1935年2月，医院共收治伤病中2万多人次，最多时一天就收治了1000多名伤员，基本适应了当时部队频繁作战的需要。”^[76]总医院及各分医院在战事不激烈、伤病员不多的时候，常派出多支小分队，到周边为群众免费诊治，宣传卫生知识。

1933年7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在通江毛浴镇成立川陕省工农总医院，后迁至通江县肖口梁，主要为党政机关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集医、政、教于一体，采取纯中医治疗，下设政治部、医务处、总务处、秘书科、病号连。“自工农医院开诊之日起，附近群众来医院求医者，每日少时近百人，多时几百人。”^[77]苏区内各县（市）基本都建立有工农分医院或医务所（室），区、乡苏维埃政府基本都建有工农药房（铺）。工农药房有医生专门给当地干部、群众看病，收支由经济公社统一核算，病人看病一般不收药钱和号脉费。工农医院及其分医院在川陕苏区时期共收治伤病员“26000余人，愈者据王朝六同志（总院长）说有23000余（人）”^[78]在战争激烈时，工农总医院及各分医院也收治在战争中受伤的红军战士，或抽调部分医生支援军队医院的伤员救治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川陕苏区创办工农总医院1所、

分医院 6 所，县工农医院 6 所，工农药店、药铺 160 余个。

此外，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还鼓励民间医生开办私人医院、药铺，走乡串村为群众治病。内务部卫生局负责对私人医院医生登记、管理。川陕苏区医疗卫生体系如下表所示^[79]：



激烈频繁的战事、敌人的严密封锁，导致苏区内缺医少药。红四方面军、苏区党政采取大力招募民间医生，高薪聘请白区的医务人员，转化国民党军队医生，开办西医、中医和看护培训班培养医务人员等方式，破解医生紧缺难题，并在战事激烈伤员较多的时候，招募“招待兵”解决护理人员不足的问题；采取开垦药田种植药材，成立采药队采集中草药，自制药械、药剂，通过秘密交通线采购等方式，克服了药材、药械短缺的难题，有力保障了苏区军民的健康。

红四方面军、苏区党政还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卫生文明运动，包括以预防传染病为中心的卫生防疫运动和以讲究卫生除害为中心的清洁卫生运动。川陕省苏维埃内务委员会设卫生局，县苏、区苏、乡苏设内务委员会，是苏区从省、到县、区、乡开展卫生文明建设的专职机构，具体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卫生防疫措施的工作。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和川陕省

工农总医院还研制了大量预防和治疗疟疾、伤寒的方剂，专门开办牛痘训练班，对100多名医务人员进行了接种牛痘疫苗的技术培训后，在苏区第一次普遍推广接种疫苗。

红四方面军入川前，通江、南江、巴中地区是四川种植鸦片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且吸食成瘾者众。红四方面军、苏区党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戒烟运动，将鸦片的种、吸、售等环节予以切断并严格控制，并组织医生研制出戒烟丸，帮助数万名鸦片吸食者成功戒烟，成功禁绝了鸦片。烟田变粮田，吸食者戒烟后成为优质的兵员或苏区建设的主力，取得了良好的军事、经济、社会效益。

红四方面军、苏区党政还非常重视对红军战士、人民群众进行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印发了《卫生常识》《战地卫生》等书籍、资料，并组织工作队进村入户开展宣传普及工作，提高红四方面军战士和苏区民众的卫生防疫意识，推动形成良好的卫生防疫习惯。

以军队医院为主、地方医院为辅、私人医院为补充的川陕苏区医疗卫生体系，有力保障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身体健康和伤病员恢复战斗力的需要，也让川陕边人民彻底告别了“生疮害病颇命磨”的悲惨命运，为川陕苏区的发展壮大、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医疗卫生保障。

三、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后勤保障工作的经验和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由于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前的小河口会议上、各位高级将领的对张国焘个人专断进行了坚决斗争，入川后，徐向前等革命家对张国焘“左”倾言行进行了坚决抵制，因此，整个川陕苏区时期，

党的集体领导和分工协作机制得到了较好的坚持，中央的各项指示都能够创造性地落实，体现在军事后勤工作方面，

一是重视后勤机关的政治建设。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和各军的经理处都建立了党的总支部，师、团经理处和军需生产储运单位均建立了党支部，配备了政治干事，时常开展政治教育，让后勤人员树立了听党指挥、一切为了前方、一切为了胜利的思想，养成了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革命精神。川陕省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川陕省党在工会工作中的任务》指出：“立即动员全党建立工人中的产业的支部（尤其是赤江的五金、兵工工人，国家缝纫社——赤北、万源的铁厂工人，长赤的煤炭工人，阆南的盐井工人，嘉陵、渠江一带的般业工人），使这些产业支部的领导机关和各县委发生最密切的关系。”^[80]，在毛浴镇召开的红四方面军党政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政治部必须派出政治干部到后勤部门，“专门担负这方面的工作。”“加强对后勤部门的政治领导，提高医疗质量，保障物资供应。”

二是不断细化军事后勤工作的纪律红线。中共川陕省委和西北军区政治部按照我党的群众路线和关于军事后勤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范确保军事后勤工作不损害群众利益，如《红军须知》第一期重申“三大纪律”的基础上，中共川陕省委1934年1月印发的《须知》涉及后勤保障工作的纪律规定则更加详细：“不拿穷人一针一线；不乱拿穷人粮食；对穷人态度要亲爱；打土豪一定要归公；借穷人东西一定要还原处；不能打木器烧；行军要捆卧草、上门板……爱护枪不要弄坏；节省子弹匆（勿）乱打……得物资要先顾伤病同志”^[81]。这些具体政策和纪律规

定的不断细化和优化，不仅给红四方面军军事后勤工作明晰了纪律红线，很好地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也从根本上确保了人民军队没有走上国民党军队那样通过巧取豪夺来解决军队给养的邪路。

三是不断拓宽开源节流这一军事后勤工作的正确路径。川陕苏区创建伊始，我党就把解放生产力、发展苏区经济作为解决军队后勤物资供应的主要来源，首先，开展土地革命，红军一入川，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区政治部便颁发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川陕苏区成立后，苏区党政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结合川陕边实际，发布了《川陕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土地分配工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其次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帮助绝大多数吸烟成瘾的“瘾君子”摆脱了烟毒的折磨；同时，发布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农业生产和减轻群众负担的政策措施，如《公粮条例》规定：“成年（人）收谷五背以上者，应纳苏维埃公粮五升……如完全系旱地，即纳包谷、麦子、豌豆或杂粮。可分两季缴纳”^[82]，《税务条例》则规定：“屠宰：专门在市场营业者，按每百斤百分之三抽收。但工农冠婚丧祭，自己养肥之猪，自己杀着吃，皆得免税”^[83]这些显著区别于国民党军阀名目繁多且高额苛捐杂税的轻徭薄赋，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种粮养猪的积极性，苏区连续两年获得粮食大丰收；还开办经济训练班培养经济管理人才，颁布《营业条例》《商业条例》《税务条例》《银行条例》等法规和《告商人书》等布告，实行了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开明开放的工商业政策和财政金融税收政策，促进了苏区手工业的发展和商贸流通的繁

荣。在大力发展苏区的经济的基础上，1933年6月23日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红军与地方武装决议（草案）》第七条规定：“关于军用物质与兵工厂。如粮食、布匹、盐、煤、铁、药材等物质以及医院伤病等的需要，应一面大大的动员群众来帮助与拥护，一面又要要有计划的收买征发与集中，这不仅要解决目前的需要，而且要作远大的计划，以充实革命战争和同帝国主义作战的物质基础。对兵工厂要搜集器材与人才，使小规模军事工业逐渐的扩充。”^[84]

同时，把节约利用资源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常抓不懈。1933年4月13日，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就对节约粮食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各机关要节省粮食，每天吃两顿稀饭一顿干饭^[85]”。西北军区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年关斗争的重要通知》、川陕省第四次党代会通过的《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等，就节省弹药、节约物资、节省原材料、利用废物等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是根据郑义斋《从实行购买制度中来节省经济》等政策建议、改党政机关的办公生活用品的实物供给制为计价购买制，在财政预决算制的建立和完善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有效地促进了川陕苏区节约运动的开展，大大提升了资金和物资的利用效率。

四是从研究解决军事后勤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推进军事后勤的规范化建设。1933年6月，木门军事会议对军队进行整编的同时，对后勤机关亦进行了规范。1933年8月，红四方面军召开全军医务工作会议，集中讨论解决了“组织上的紊乱”“领导不集中”“不注意总务工作”“医务主任还作政治处的工作、总务处的工作”“对伤病号的教育和安慰工作，做得非常不充分”^[86]等问题，对于促进红四方面军总医

院的发展壮大和规范管理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人民军队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就是因为始终坚持了党指挥枪这条根本原则；中国人民之所以从深重灾难中摆脱出来、站立起来，还是因为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路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从几近分崩离析的悬崖边回过头来、浴火重生走向伟大复兴，更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川陕苏区时期军队后勤工作卓有成效的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军队才能无往不胜、我们的人民才能幸福安康、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当前，我市正奋力建设“三市两地一枢纽”，奋力追赶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步伐，尤其需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尤其需要政治生态清明、政商关系清白、营商环境晴朗，尤其需要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尤其需要各级领导高效务实地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问题。

（二）坚持依靠人民是成就事业的力量源泉。我党创立伊始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饱受军阀、地主豪绅欺凌的川陕边人民，自从跟着共产党走出“兵匪为患、烟毒遍地、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87]，过上耕有其田、食能果腹、需有所供、困有所助的幸福生活之后，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支援红军、保卫苏区的战斗中，不仅先后有数十万人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更是积极从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红军，供给红军，保证红军的后勤物资需要。

一是全力投入农业生产。用兵制胜，以粮为先。川陕苏区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土地的主人后，在党的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政策措施的激励下，广泛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

如开办耕牛、种子、农具合作社，实行种子和生产工具的余缺调剂，组织代耕队，替红军和地方武装参战部队家属以及弱劳、缺劳者抢种抢收，响应党组织关于“各机关工作人员至少每人种五颗洋芋”^[88]“每个小娃娃种五窝洋芋，点五窝瓜菜”^[89]“每户人喂四只小猪，每户人喂四只小鸡，每个人点五窝瓜，每个点二十窝包谷”^[90]的号召，实现了“不让苏区一寸土地放荒”的目标。特别是据《川陕苏区粮政史料》记载，川陕苏区时期的通江“三县两特区”共为红军提供粮食4660多万斤，占全部军粮的近三分之一，为军事斗争的开展、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

二是节衣缩食，捐献大量物资。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期间，红军收紧阵地，后勤物资极度缺乏，苏区人民牙囤口积筹军粮，纺纱织布做军装，捐献铜铁造刀枪，腾出房屋做营房……倾其所有，支援红军。“根据地的群众真好，一点点粮食自己舍不得吃，送给前线，送给红军。”^[91]

“有的给红军送去了准备用来换油换盐的鸡蛋，送去了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老母鸡；有的送去了收藏的腊肉、干菜；还有的老大娘把积攒了好几年、亲手一朵一朵掰出来的棉花、一丝一丝纺出来的棉纱送到乡苏维埃，捐给红军做衣服……丰收之后，人民群众首先想到的是英勇作战的红军指战员。人们用筛子筛、风车扬，整出最好的粮食，一背背、一挑挑，源源不断地送往红军驻地。人们挑拣出上等棉花，纺纱织布，送往被服厂为红军做军衣。此时，根据地再无土豪可打，吃的穿的全取之于民。数万军队所需之物，依靠根据地人民和扩大的新区人民的支援得到解决。乡亲们还经常抬着肥猪，牵着羊，背着鸡鸭去慰问红军。有的连地里的瓜香了、树上的果熟了，

也要摘上一背篓送给子弟兵尝尝鲜……”^[92]。据留存下来的川陕苏区时期的报刊资料记载，1933年下半年，当苏区群众粮食丰收，生活改善后，给红军特别是红军后方医院捐赠衣被、食品或资金的现象就比较踊跃。1933年12月16日《共产党》第31期报道：“前日，我东方军之一部出发前线杀敌，经赤江城时受到全城群众空前热烈的欢迎。当晚欢迎队伍沿途（路）边排开，长有数里，轰天震地的口号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抬猪招待的非常多……”^[93]。据1934年1月1日《苏维埃》第21期报道：“赤北县苏及各区拥挤三分医院物质，被盖木床，腊猪六只，白米一石五斗，鞋子十双，袜底二十一双，草鞋十五双……”^[94]。据1934年2月6日《共产党》第43期报道：“各地拥挤红军的物质都大批向医院里送。巴中县青（清）江渡李卢纪念大会上，群众拥挤的物质非常多，计有猪三十条，草鞋六百三十双，鞋子二百零四双，袜底十三双，手巾五条，挂面一千六百二十七把，棉絮三十条，羊腿六个，洋钱四十元，鸡蛋一百六十个，条粉一百零七斤，大块糖（一斤重）七十七个，白米一斗，欠粉十斤，红糖三百九十斤，红甘蔗二百六十根，饼子一百零五个，豆腐一箱，柿饼二百六十个，白萝卜一百斤，白菜五十根，青菜六十斤，灰面三十斤。赤北县在那天拥护的物资有肥猪二条。省委本身总部工作人员拥护红军也异常踊跃。收本部少共洋二元，收妇女部钱十串三百，收妇女部钱十二串九百，收妇女部钱十五串，收油印股钱四串二百，收宣传队钱十四串五百，收各部门二十二串二百，收监察委员会二串四百，共合部拥护医院钱一百三十八串一百文正。”^[95]。1934年10月7日《少年先锋》第87期报道：“赤北县一区二乡拥护白米七斗六

升，包谷四升，谷子六斗六升……”^[96]。尤其是1934年5月至8月，川军对川陕苏区发起第四期总攻期间，苏区军民不得不收紧阵地到通江大部至万源一部的狭小地域内，在这最为艰难的四个多月里，通江人民则主要承担了红军、地方武装和党政机关约20多万人的粮食供应。

三是全民支前。川北交通闭塞，山道崎岖，断崖绝壁随处可见，为克服运输不便的困难，如前所述，数十万群众参加了运输队，把弹药、粮食等物资运往前方，将伤病战士转运后方。这些艰难“蜀道”里的红色“栈道”，保证了伤员、弹药、粮食、盐巴及其他物资顺利地运送和转移，在反“围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川陕苏区时期红军战斗到哪里，群众支前队伍就跟进到那里。

徐向前元帅在论及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原因时提到“川陕根据地后期的情况，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民穷财尽。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兵员补充，别说部队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问题……从我军入川到强渡嘉陵江的两年零三个月里，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我们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消耗。战争过程中，敌人两进两出，在我根据地空舍清野，烧杀掳掠，破坏尤烈”。虽然川陕边人民只过了两年的好日子就因为战争的消耗和敌人的破坏又回归“民穷财尽”的艰难，但他们就因为从共产党的旗帜上看到了幸福生活的曙光，所以就无怨无悔地“宁肯自己吃野菜、喝清汤度日，也不愿让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挨饿”，义无反顾的把最后一滴汗水洒在支前路上，特别是在红军离开后那段极端艰难的岁月里，老区人民还以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舍命

保护革命文物熬过了那段黎明前的黑暗。

百年党史不仅是我党一切为了人民夙夜在公的奉献史，更是我党一切依靠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奋斗史。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置身于纺织工、煤矿工、铁路工和农村的贫雇农等受压迫阶层之中，为他们争取平等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在全国建立人民政权之后，又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带领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民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仍然是我们党克服任何艰难险阻的致胜法宝。当前，巴中建设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的宏大实践中，更加需要集中民智、凝聚民心、珍惜民力。

（三）坚持统一配置资源是提高效率的关键措施。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建立统一的财政经济和物资管理制度，广泛推行预决算管理。1933年2月颁布的《苏维埃组织法及各种委员会的工作概要说明》就明确规定：“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会计科，管理银钱收支。有多的款子存银行。审查各地账目，规定预算决算，要特别注意节省”^[97]。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要求“苏维埃要集中经济，作有计划的运用”^[98]。1933年7月23日，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兼川陕省苏维埃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郑义斋在《干部必读》第30期发表《对于经济物质集中统一支配和彻底整理问题》一文，指出：“目前川陕苏区日益开展与巩固，红军猛烈扩大与坚强，关于‘经济物质集中统一支配’问题，是迫不急待的要来彻底整理一番，才能适应

目前革命战争胜利条件。”严肃批评了个别部队“仍袭行军性质，对于经济物质都有‘保守’的不正确观念（如三十军、三十一军保存现金不报，尤其是九军保守性浓厚），工农银行的钞票、纸币都不欢喜使用，这是没有把阶级的钞票认识清楚的错误。”有针对性地提出：“实行经济物质集中统一支配，彻底整理财政经济系统办法：（1）健强各级财委会经理处的本身工作，加紧开展经济建设，经济来源要从建设中去寻找……（3）切实执行预算和决算，各级财委会经理处每月底要有预算和决算表册报告上级，上级根据预算表，计划下月整个开支。（4）各级经常要有经济、粮食、油、盐、衣服、布疋、花..等物品精确统计，报告上级，上级能了解整个经济物质情形。（5）坚决执行现金集中，充实工农银行基金，俾得银行马上开兑，扩大钞票信用。（6）加紧普遍宣传群众使用银行钞票与纸币，流通苏区金融。（7）加紧宣传白区客商小贩大批运来棉布、净花、中西药材、食盐..等物到苏区贩卖，同时宣传苏区群众织布卖给我们（要积极准备红军冬衣），立刻进行打听购买需要物质路线，尤其是在赤白交界地点。（8）加紧宣传累进税的意义，使每个工农群众了解，一致起来拥护税收，增加苏维埃经济来源。（9）加紧扩大经济公社的组织，收买物质，供给红军与群众需要。（10）加紧宣传与普遍建立各种合作社的组织，开展农村经济建设，供给群众需要，改善工农生活。”^[99]。1933年11月4日召开的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在《决议》中要求：“各级苏维埃没收的银钱财物，通通要缴到上级来……各级苏维埃没收的粮食要保存好，县和区粮食委员会全都要设粮食站，把粮食集中起来……没收豪绅地主或富农多余的粮食，

动员群众收红军公田的粮食，按照苏维埃公粮条例征收公粮……分别红军公粮仓、苏维埃公粮仓、社会保险仓，保存粮食”^[100]。川陕省第四次党代会通过的《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再次强调：“各级苏维埃的开支，按期清算，厉行统一经济，工作人员一律发工资”^[101]。实行资金和物资集中统一管理，为保证各部队后勤保障的公平性奠定了基础。

在坚持基本物资公平保障的基础上，则对战斗任务重、战功突出的部队实行奖励性质的优待，如，据1934年3月21日《干部必读》第75期报道：“我全四方面军于本月二十一日在庙坪场举行全军实弹射击比赛，并准备有优胜旗及其他物品等（奖章、鞋袜、衣服）以资奖励全军加紧学习射击瞄准之优胜者。”^[102]据1934年3月23日《干部必读》第76期报道：“优等射手第一名为八十团五连向臣柱，得奖励第一号优胜旗一面，最好之新盒子枪一架，子弹十条，衣服一套，鞋袜各一双，并且他全连每个战士都有一双鞋。射手第二名三十三团二连郭全三，得第二号优胜旗一面，衣服一套，鞋袜各一双，亦与第一名同样，连上每人有一双鞋。”

^[103]据1934年6月《干部必读》第82期报道：“这次西方一部分队伍实弹射击比赛于六月四号在赤江县举行……优先射手除他自己得到的奖励品而外，连那一团的团长、团副、团政治委员，以及营长、营副、营政委，和连长、连副、指导员，均受得军事委员会奖赠品。因他们平时对战士教育督促精神好（如二七六、二六四、二六六、二七一等团）。兹将最优等射手前五名列出。第一名何正培同志，得奖品第一号优胜旗一面，一号奖章一个，银洋一元，新式三把驳壳枪一架，子弹五条，好挂表一个，衣服、鞋袜牙刷、牙膏、小

手帕、毛巾等品。外他全连每个战士都有一双鞋。”^[104]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东线总反攻由奇袭青龙观拉开序幕。“奇袭青龙观的任务，交给九十三师二七四团执行”^[105]。老红军战士周学义、李富智的回忆文章《夜摸青龙观》记载：“一九三四年七月间，是反刘湘六路围攻战斗最紧张的时候。情况越来越严重。由于部队集中，根据地粮食供应困难，我们终日以野菜、树皮度日，一个个吃得面黄饥瘦，病号也随之增多……攻击的日期选定在八月的一天晚上。出发前，突击队员穿好了上级发下来的厚底鞋，蹲在一起，准备饱餐一顿树皮、野菜，养足精神好战斗。等饭端上来，大家一看，就惊叫起来：‘土豆？哪儿来的？’当时土豆是头等的好饭，只有伤病员才能吃上。炊事员说：‘这是兄弟部队凑来的。’队员们听了很感动，嘴没说什么，可心里都憋股劲，坚决爬上去，为全军打开胜利的道路。……这次战斗中，二七四团胜利地完成夜摸青龙观的任务，给全军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红四方面军总部奖给二七四团一面“夜摸长（常）胜军”的奖旗，和每人一套黑衣服。”这种后勤物资优先满足担任突击攻坚任务的部队，奖励战功突出的团队和战士的办法，大大激发了全军战士奋勇争先的热情，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的集中统一的决策指挥体系保证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探索完善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对于高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提出“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体现出我们党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论智慧，宣示了“市场化”导向的坚决态度，还为防止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变成“闲不住的手”指明了方向。《决定》同时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因此，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和作用最小化。反而更加需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维护全国集中统一的大市场，顺畅地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更好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应对世界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和挑战，则更应当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各级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当下的巴中正在奋力追赶全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决策执行效率尤为珍贵！

（四）全民国防动员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战争进程中，全民军事化，一面坚持农业、军工和其他物资的生产，源源不断向红军提供大批粮食、武器、弹药、被服、鞋袜等，一面担负侦察、运输、袭敌扰敌、转运伤员、修桥铺路、坚壁清野、构筑工事等任务。红四方面军和苏区党政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行全民军事化。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在提出“党要建立赤卫队，领导并建立少先队、童子团的组织……厉行群众的军事教育。”^[106]的同时，

强调“在这里党团员的军事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工作的建立，对红军干部的补充与群众军事教育的领导，都有非常大的帮助。”^[107]1933年5月10日，中共川陕省委作出的《保卫赤区运动周决议》要求：“省委、省苏、省工会以下各地机关，加以彻底清洗与改造……各级机关之轻便化与军事化”^[108]又号召党政机关实行军事化。

1933年7月5日，共青团川陕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接受党的二次大会决议和川陕共产青年团今后的任务》明确要求“实行全苏维埃区域的劳动青年军事化，普遍的武装劳动男女青年”。^[109]

在推动党团员、机关干部和苏区劳动青年军事化的基础上，1933年8月8日，川陕省地方武装大会在通江新场坝召开，正式成立了川陕省军区指挥部，颁布的《川陕省军区指挥部条例》规定：省、县两级军区指挥部专门“负责建立、领导和指挥该军区内的赤卫军、游击队、独立营、战斗连等武装组织，并帮助少年先锋队的发展，在作战时负责指挥少年先锋队……训练群众的军事知识”^[110]，则标志着全民军事化跃升到了高度组织化的新阶段，同时，1933年8月10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颁布的《西北军区赤卫军条例》规定：“三、赤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为了军事行动和革命战争的需要，可组织临时的少数常备队伍。一团赤卫军的常备队伍，至多不能过一连人，任务完毕时仍可参加生产，担负一般赤卫军的任务。”^[111]则全面规范了全民军事化运动中地方武装的组建与管理。

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共川陕省委就“决定在各县立即组织战斗委员会……在战时指挥各

该县战争的组织……还要负责领导地方党部、团部、苏维埃、工会……在作战时期，省委把该方战线上的责任托付给战斗委员会。”^[112]。这一战时动员机制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川陕苏区的战时全民动员参与搞好战勤服务的效率，为赢得这场历时十个多月的艰苦决战提供了坚实而高效的后勤保障服务。

1934年9月召开的川陕省第二次地方武装大会，在总结前期全民军事化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的《决议案》要求“把全苏区的男女老少把连武装起来，每人不论刀、矛、枪、土铳、木棒，要有一种武器……；男女游击队要到处打游击，打到敌人后方去。赤卫军不脱离生产，二十四岁到四十岁的穷人普遍加入。十天二十天操（练）一次，担任戒严，打反动，少先队（十六岁到二十三岁），平时不脱离生产，随时配合赤卫军行动。童子团，加紧站岗、放哨、捉侦探和读书识字文化工作。”^[113]具体做到“各种革命机关及群众团体均按照排、连、营编制起来，早晚均过军事生活……（三）在各地俱乐部中，应有经常的军事讲演与军事技术训练和游戏。（四）各机关、各革命团体在每日晚餐后，各采用军事游戏和体育训练，如象打球、赛跑、跳高、跳远、翻杆子和翻越障碍物及使用武器射击瞄准、地形识别、距离测量等等，各地要有红场的设备……利用一切机会（如到敌人军队中去，到敌人军事学校中去和在支部生活中，彭杨学校中及各种生活等等）来提高军事专门学识。”^[114]。川陕苏区基本形成了以正规武装为主、地方武装为辅，党政机关干部、群团组织成员、各工厂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按照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见缝插针开展军事训练、战时全员投入实战的兵民一体

全民军事化格局。

全民军事化格局的构建，在保卫后方安全、战时支援前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等积极站岗放哨，捉拿了无数欲破坏苏区建设的国民党探子、反动人员。再如“五百农妇缴械一团白军”的战例，不仅成功地完成了伤员的转移任务，还挫败了国民党军队欲破坏苦草坝后勤基地的阴谋，是全民军事化助力军事后勤工作的有力例证。此外，苦草坝后勤基地各工厂多次挫败与国民党相勾结的土匪的破坏，也得益于全民军事化。

我们的人民有幸跟着中国共产党享受了70多年的和平环境，70多年来，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但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颠覆破坏一刻也没有停止。“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我们珍爱和平环境、维护和平秩序，就必须不断强化全民国防意识、打牢全民国防动员基础，以高度自觉的国家观念、国防安全意识，把“有国才有家、国强民幸福”的理念植根灵魂深处、见诸实际行动，毫不含糊地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及其国内代言人诋毁中国共产党、诋毁英雄模范人物、膜拜西方伪民主制度等言行。

（五）坚持排难创新是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路径。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的后勤保障工作面临着诸多困难：敌人不间断的、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恶劣的生产条件和落后的生产力，资金、物资、设备极端匮乏，山高路险导致物资运输困难，后勤保障设施不健全……面对种种困难，红四方面军和苏区党政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建立多条红色交通线，大力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创

新生产工艺和药物研发……不断排难创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破解一个个难题中高质量地完成了军事后勤保障工作。还通过创新战略战术，赢得了一次次战役战斗的胜利。1934年11月，在通江县毛浴镇召开的红四方面军党政工作会议上，制定的“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军训训词，是红四方面军在血与火的严酷革命战争历程中总结凝炼而成的，是红四方面军的不朽军魂，是红四方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秘诀。其中，排难创新是川陕苏区架起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桥梁的重要方法路径。回顾党的历史，我们之所以能历经危难而不倒、跌破险境通大道，除了坚如磐石的信仰支撑，还有不倒排难创新的方法路径。红四方面军军训训词所蕴含的宝贵精神，对于激励当前巴中建设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市的恢弘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2021年，巴中市通过立法程序，把红四方面军军训训词确定为新时代巴中城市精神，这是巴中人民对传承和践行红四方面军军训训词精神的庄严宣誓。巴中的振兴发展，面临着基础设施差、人才支撑弱、产业层次低等诸多困难，只要我们坚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断排难创新，巴中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结 语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川陕苏区和其他苏区在军事后勤工作上的探索实践，在人民军队军事后勤工作体系化、正规化建设上破题开篇，创造了许多至今传承和弘扬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宁愿忍饥挨饿、也不侵犯群众利益的后勤工作原则红线的确立，对于人民军队高扬信仰旗帜、赢得人民支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开辟的依靠人民、开源节流的军事后

勤正确道路，坚持集中统一调配资源提高了军事后勤保障效率，实行全民军事化厚植了军事后勤人力基础，用排难创新的方法克服了军事后勤保障的重重困难，有效保障了人民军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诚然，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在军事后勤工作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但红四方面军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结合川陕边实际，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军事后勤工作保障体系，有力保障了军事斗争的胜利和苏区各项建设的蓬勃发展，其很多经验和做法，是我军军事后勤工作的宝贵财富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落实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要求，推进军事后勤“三大建设任务”不断取得新进步。在实现百年强军目标的新征程上，全军上下正“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任务落实，加快建设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和军队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加快推动现代后勤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115]全党上下正带领全国人民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着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牢固树立整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排难创新，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参考文献

- [1] 解放军报评论员，《强国强军必须强后勤——认真学习贯彻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解放军报》，2016年11月11日。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第106页。

[3] 《红色中华》第三期，1934年1月26日。

[4]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235页。

[5]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235页。

[6] 周纯全：《川陕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总结》，载《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第98页。

[7]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93页。

[8]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332页。

[9]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333页。

[10]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155页。

[11]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80页。

[12] 任照：《川陕时期红四方面军后勤物资筹措问题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3年。

[13]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1582页。

[14]（摘自《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

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158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后勤》，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16] 徐向前：《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17] 李清扬、贾晓明：《方子翼将军的“三次进攻战役”》[N]，《人民政协报》2013年3月21日。

[18] 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19]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集成》（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1622页。

[20]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229-230页。

[21]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集成》（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53页。

[22]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753-756页。

[23] 《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293页。

[24]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1565页。

[25] 《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293页。

[26] 四川大学：《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44页。

[27]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416页。

[28]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1533页。

[29]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52页。

[30]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28页。

[31] 温贤美：《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32]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484页。

[33]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500页。

[34] 《永远不忘艰苦的岁月——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姚明善的回忆》，载《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第75页，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内部资料，1982年。

[35] 余洪远：《川陕省金融事业为壮大红军提供装备》。

[36]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2016年7月第1版，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18页。

[37]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594页。

[38]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43页。

[39]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217-218页。

[40]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

版，第 170 页。

[41]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0 月第 1 版，52 页。

[42]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0 月第 1 版，83 页。

[43]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30 页。

[44]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0 月第 1 版，346 页。

[45]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55 页。

[46]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59 页。

[47] 《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第 297 页。

[48] 《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第 298 页。

[49]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 年，第 297 页。

[50] 《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1945 年版，第 227 页。

[51] 《四川日报》1934 年 10 月 25 日。

[52] 《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19 期。

[53] 林月琴：《回忆妇女工兵营》。

[54] 王泽南：《妇女运输连》。

[55] 林月琴：《回忆妇女工兵营》。

[56] 王泽南：《妇女运输连》。

[57]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

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342页。

[58]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227页。

[59]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231页。

[60]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310页。

[6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

[62]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159-160页。

[63]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160页。

[64]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163页。

[65]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218页。

[66]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218页。

[67] 参见陶万荣：《妇女独立营》。

[68] 《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第300页。

[69]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0页。

[70] 《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第301页。

[71] 傅崇碧：《傅崇碧回忆录》。

- [72] 李德生：《记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的斗争》。
- [73] 张才千：《回忆反“六路围攻”》。
- [74]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2页。
- [75] 徐向前：《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 [76] 谢燕：《张琴秋的一生》[M]，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
- [77]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编写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Z]，内部出版，1979年。
- [78]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编写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内部出版，1979年。
- [79] 张玲、胡澜：《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川陕苏区医疗卫生工作探析》，2005年第5期。
- [80]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229页。
- [81]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1018-1019页。
- [82]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204页。
- [83]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205页。
- [84]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82页。
- [85]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52页。
- [86]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大学

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509页。

[87]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142页。

[88]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601页。

[89]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374页。

[90]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385页。

[91] 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

[92] 傅崇碧：《难忘的故乡人民》。

[93]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573-1574页》。

[94]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578页。

[95]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593页》。

[96]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631页。

[97]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37页。

[98]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53页。

[99]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779-780页。

[100]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

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66页。

[101]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335页。

[102]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613页。

[103]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615页。

[104]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621页。

[105]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208页。

[106]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43-44页。

[107]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43-44页。

[108]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73页。

[109]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00页。

[110]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39页。

[111]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30页。

[112]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935-936页。

[113]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

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309页。

[114]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83页。

[11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21年11月22日。